

徐柏園對臺灣經濟發展之貢獻

張 導 民

徐柏園先生浙江蘭谿人，天賦聰穎，卓而不羣，精通經濟理論，長於財經管理，歷任政府重寄，為國獻替良多，政府遷臺之初，通貨膨脹，物價高漲，經濟凋敝，民生困頓，當時先生毅然大力參與財經大計，盡心竭智，籌謀獻策，使臺灣幣值改革有成，金融物價日趨穩定，厥功至大。嗣為開發海島貿易，致力臺灣經濟建設，主持財政金融，多有顯著績效，無不為人稱道。余與先生相交數十年，茲就其在事功上，列舉三點，以追思其對於國家之無比貢獻。

臺灣幣制之改革

臺灣受日本統治壓迫五十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本在臺儘量搜刮，以致民窮財盡，由於我國對日抗戰八年，終獲擊敗日本，得以光復故土，當時在臺灣流通之「臺灣銀行券」，已失去其發行準備，政府為便利接收工作，乃允許以「臺灣銀行券」兌換等值的「臺幣」——為臺灣銀行發行之地區性貨幣，即後稱之「舊臺幣」。

「臺幣」於民國卅五年五月間發行時，政府規定其與「法幣」及「金圓券」的兌換比率，應按

照上海與臺北兩地間物價水準調整。民國卅六年下半年，大陸局勢惡化，幣制改革失敗，引起超速通貨膨脹，因「法幣」及「金圓券」兌換「臺幣」比率偏高，乃致使大量資金從大陸流向臺灣，「臺幣」隨之膨脹。民國卅八年初，大陸變色，政府播遷臺灣，大量人口來臺，使臺灣經濟的負荷驟然沉重，政府所入，不敷支出，不得不增加「臺幣」發行額以彌補赤字預算。民國卅五年底，「臺幣」發行額為五、三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鈔票面值最大者為一〇〇元，迨至民國卅八年六月十五日，其發行額達五二七、〇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為民國卅五年年底發行額的九九倍，鈔票面值最大者為一〇、〇〇〇元，約占發行額的百分之八十四點二，人民對幣值完全失去信心，整個金融已陷入極大的混亂，「臺幣」面臨破產邊緣，必須加以改革，政府乃於民國卅八年六月十五日頒佈「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」及「臺灣省進出口貿易及滙兌金銀管理辦法」，規定改用「新臺幣」以取代「舊臺幣」。「新臺幣」對外滙率以美金為準，「新臺幣」五元折合美金一元，進出口貿易及其他外滙收支，由臺

灣省政府自行統籌調度，從此臺灣的金融與外滙始趨於穩定，對外貿易漸恢復正常。「新臺幣」改革為臺灣的經濟發展鋪出一條生路，使臺灣各項經濟建設，得在金融穩定的情勢下，順利開展，其時先生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並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，對「臺幣」之改革，參與擘劃籌謀，對臺灣金融之安定，厥功甚偉。

對外貿易之開拓

臺灣地狹人稠，可耕面積有限，約為臺灣面積的四分之一，地質貧瘠，沃度不高，農作栽培，非仰賴大量化學肥料不可，農產品以糖、米為主，甘藷、花生、茶葉、鮮菓次之，惟產值有限。由於工業資源缺乏，工業發展緩慢，臺灣的經濟遂陷停滯不前狀態，政府遷臺之後，有鑒於國民經濟，關係國計民生，乃積極規劃從事於臺灣經濟建設發展工作。

臺灣為海島經濟型態，兼以本島天然資源不足，故亟需發展對外貿易，交換有無。一方面輔助農工增產，充裕物資供應，一方面合理管制物價，阻止通貨膨脹，同時實施複式滙率，全力拓

展外銷。民國卅九年至四十四年間，臺灣的國際收支，商品及勞務帳戶均呈現鉅額逆差，商品帳戶逆差金額高達四四四、〇〇〇、〇〇〇美元，占輸入值百分之四十，是國際收支情況最惡劣時期，政府為打開對外貿易困境，乃成立外貿會，專責規劃拓展對外貿易，實施外匯管理，使政府的外匯調度能為最妥善的運用。五十一年政府再度徵召柏園先生為外貿會主任委員，借重先生經濟長才，積極展開對外貿易，有效的削減進口至所希望的程度，使外匯預算得以順利執行，並利用各種方式刺激鼓勵外銷，以爭取外匯。先生於外貿極度困難中，曾要以「點石成金，無中生有，上山下海，入地騰空，從四面八方，衝破藩籬，打開局限」之信心，堅定無比之魄力，推動對外貿易，遂使出口逐年不斷增加，開創我國外貿新局。根據海關統計資料，以美金計算的出口總值，從民國四十一年至五十年間增加百分之七十七；五十一年至六十一年增加十二倍半，平均年增率為百分之卅。隨着出口的增加，進口管制亦不斷的放寬，但進口仍較出口增加為慢，因此，國際收支不斷的改善，商品貿易自六十年起呈現出超，臺灣貿易，從此由「入超」轉向「出超」，快速邁進。由於貿易擴張，經濟成長快速，進出口貿易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迅速提高，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導向。臺灣對外貿易，能有今日之成就，先生當年奠定外貿與外匯管理之基礎，實屬功不可沒。

中央銀行之復業

金融制度之健全，與金融體系之建立，不僅有助於政府財政的安定，更於國民經濟之發展，有無比之助力，故凡經濟進步的國家，無不有嚴整的金融系統，與健全的金機機構，予以靈活運用，使全國之經濟活動，均納入於金融網內，資金輸送，能暢達於各個經濟部門，徐急多寡，運用自如。因而經濟之進步，必須有賴於健全之金融制度。

政府遷臺以後，上下團結一致，勵精圖治，國民勤勞節儉，努力生產救國，遂使國民經濟呈現在穩定中求發展，惟以中央銀行業務，未經正式恢復，以致金融運用調度，缺乏領導中心，無法發揮中央銀行應有功用，對於當前國家經濟之發展，與執行對敵總體戰之配合，尤屬莫大障礙。

證諸世界各工商業發達國家，莫不有其堅強之國家中央銀行，完備之金融系統，統籌金融全局，從事金融調節，靈活運用調度，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，協助經濟穩定繁榮。當時臺灣銀行，雖經中央授權，負有代理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業務，但它以地方銀行地位，自無法有效遂行國家金融政策，採行有效金融必要措施，亦難貫穿整個金融組織，發揮調節金融力量，以穩定經濟局面，促進經濟繁榮的功能。民國四十九年，先生出任中央銀行總裁，有鑒於當時國內金融情勢及經濟情況，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金融領導中心，使它平時能發揮調節資金，促進經濟穩定發展，戰時能維持貨幣之安定，提供經濟資源以因應國防之需要，乃積極進行中央銀行復業。民國五十年，在先生學劃下，中央銀行宣佈在臺復

業，以執掌中央銀行法定職權，發揮應具功能。原中央銀行法，規定中央銀行之主要目的，在建立銀行之銀行，管理全國金融，統一發行貨幣等任務。先生領導央行復業時，為明確劃定央行任務，特訂定「中央銀行復業方案」，明訂中央銀行，應以建樹健全銀行制度，領導全國金融，鞏固幣信，促進生產，協助經濟發展，增進國民所得為目的；以政府機關，及銀行與辦理受授信用之金融機構，為業務對象，除去央行經營一般銀行業務，加強央行經濟研究工作，為我國金融制度與體系建立起良好規範，使一般金融機構，均成為促進經濟發展之工具。

中央銀行復業後，對於臺灣金融之穩定，經濟成長之增進，影響深遠。政府以先生策劃央行復業，功在國家，特頒授一等大綬景星勳章，以示褒獎。

先生稟賦異常，見解卓越，處事積極，勇於負責。憑其淵博之學識，豐富之經驗，每當國家財經發生困難之際，均能挺身而出，擔負艱巨，以其獨到之見解，卓異之領導，指揮若定，全力以赴，制萬難於機先，化艱因為奇蹟，事功卓著，莫不嘆服。先生不僅做事積極負責，而且待人誠摯熱忱，據知其於僚屬間，議論公事，有時氣色形之於外，但事後不復置意，私語相處，則異常親切溫煦，僚屬雖憚其嚴，但亦樂其寬。先生知人善用，凡屬才識之士，無不獎掖提携，不遺餘力。先生一生奉獻於國家，其於財經之建樹，助猶彪炳，有口皆碑，先生之長逝，乃國家之損失，特追述往事一二，以念賢勞。